

Who
is
Roland
Barthes

by Wang Min'an

谁是罗兰·巴特

汪民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谁是罗兰·巴特

汪民安 著

Who is Roland Barthes
by Wang Min'an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是罗兰·巴特/汪民安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5

ISBN 7-214-03965-6

I. 谁... II. 汪... III. ①巴特-生平事迹②巴特-思想评论 IV. ①K835.655.1②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35185号

书 名 谁是罗兰·巴特
著 者 汪民安
责任编辑 杨全强 朱晓莹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965-6/K·501
定 价 1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1	道路	
	身体旅途	1
	写作旅途	13
2	五十年代	
	写作/零度写作	22
	神话学	50
3	结构地图	
	符号学	78
	文学科学	90
	叙事学	108
4	结构乱了	
	作者之死	129
	文本	142
	符号帝国	149
	《SZ》:文本内证	161
5	欲望历险	
	躯体哲学	179

爱情戏剧	190
谁是罗兰·巴特	199
6 背影	
思想边缘	218
形式主义气质	224
遗产	235
主要参考书目	243
再版后记	245

1 道 路

身体旅途

罗兰·巴特的一生，倘若限制在写作区域里的话，那肯定是传奇的一生。这方面，他永远是个推陈出新的大师，是个文本历险主义者，他上演了一幕幕写作戏剧，就此而言，他获得了不同凡响的号召力，也成为20世纪60年代后法国知识分子中的领衔人物之一，是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时期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镜像。

然而，巴特的身体一生——如果强行地同他的写作一生，同他的思考一生区分开来的话——似乎缺乏一些戏剧性，然而同样地值得观赏。功成名就后，巴特常常遮掩他的过去，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故事充满劣迹。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谦逊，在他看来，沉湎于过去的细节，并将之公诸于世，那是些伟大人物的权利和责任，巴特显然无意将自己置入这些伟大人物的行列中，他仅仅是个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个智士，他的过去也就是一个常人的过去。另一方面，据巴特自己宣称，他的确想不起他的过去，尤其是成人后的过去，他说，他的记忆贮藏室仅限于儿时和少年时代，他能清晰地记得那时的具体生活细节，但自从他开始写作后，他就无法辨认自己了，他没有一个自我形象了，如果有一个自我形象的话，也就限于一些照

片——那里有真实的形象、年龄、时代,除此之外,他对自己一无所知。

然而,巴特到底写过一部真真假假的自传《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通过它来了解罗兰·巴特的具体生活细节。此书一开篇,罗兰·巴特就警告读者,将该书主人公最好视作一位小说(虚构)主人公,而不要对他盲信。不仅如此,这部无与伦比的著作完全避开了自传写作的种种教条,它根本就不像一部自传书。巴特尽量回避了一些叙事性的历史细节(尤其是成人生活细节),而将更多的笔墨倾注在主人公的习惯、趣味、内在世界和精神背景上,这不是一部个人历史故事回忆录,而是对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各个棱面进行耐心和饶有兴致的咀嚼、把玩。这部著作另一个不可信的地方是,巴特尽量地揶揄、嘲讽乃至贬低他此前的著作,很难说清巴特这样做的动机,但至少,我们不能将他的话视作肺腑之言,也就是说,《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窥视他的历史。

巴特对自己的历史细节躲躲闪闪的态度,或许同他的最终哲学旨趣相关。他似乎总是在寻找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无疑是对“真实性”的一种根本动摇,后者正是同本质主义相关的东西,它早就背上了形而上学的恶名。巴特从没有明确地向这种真实性及其背后的本质主义宣战,他总是在躲避和防止它们的出场,巴特对自身历史的摇摆态度恰恰暴露了他对它们的警觉,显然,巴特反感确定性,正是这种哲学原则使巴特的态度暧昧和模糊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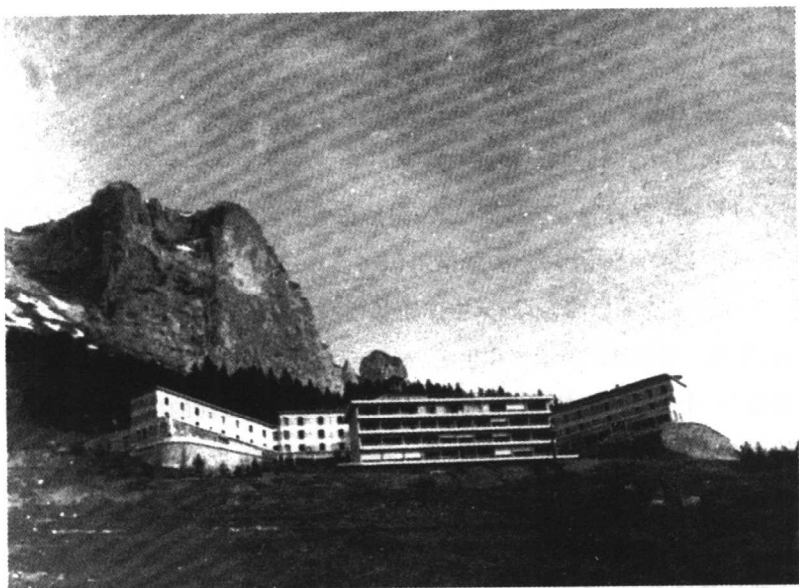
但一些不屈不挠的访谈者和研究者最终还是挖出了巴特的一些历史线索。罗兰·巴特1915年11月12日生于瑟堡(Cherbourg)一个信奉新教的资产阶级家庭,其父路易斯·巴特第二年在一次海战中阵亡,巴特在巴永讷(Bayonne)度过了他的童年,在此,他和母亲、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并向他的“终生孤独”的姑母(一个钢琴教师)学钢琴,他“生活在一种音乐空气中”。生于新教家庭,^①父亲早逝,同母亲相依为命,与音乐作伴,这可能奠定了巴特日后敏慧而阴柔的一面,他甚少写一些充满暴力的句子,^②相反,他的优雅、温和贯穿着他的所有文本(甚至在和皮卡尔的论战

中,他也显得彬彬有礼,从容不迫),这种柔和风格,虽不能说成是阴性的,但无疑也不是充分阳性的,而且,巴特在群星灿烂的法国知识分子圈中,是对女性最具魅力的一位,克里斯蒂娃、苏珊·桑塔格、安内特·拉伏尔(Annette Lavers)都是巴特的热爱者。

1924年,巴特和母亲移居巴黎,只是在假期回巴永讷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巴特的母亲亨利特·毕格尔(Henriette Binger),因为贫困,也因为一些无法说清的原因,不顾其中产阶级出身,学会了一门手艺,即书籍装订,挣得一些钱供巴特读书和生活。这段经历使巴特记忆犹新,他称他的家庭是“一个完全潦倒的资产阶级家庭”,尽管想维持以前的生活水平,但仍然不断意识到他们在物质上的败落。每学期开课前,巴特都感到一次小小的财政危机:没合适的衣服,没钱买学习用具,没钱买课本,对此,他回忆道,他“所参予的是资产阶级的生存艺术,这门艺术永不变质地生存在每次钱的危机中心。他的家庭经历,不是苦难,而是拮据,也即是说,交往的恐惧、度假问题、鞋子问题、课本问题,甚至饭食问题。这种能忍受的匮乏(如拮据总是这种匮乏一样)可解释自由补偿的哲学、快乐多元决定论的哲学、闲适(它是拮据恰如其分的反义词)哲学,他的成因无疑是钱而非性”。^③巴特将这段早期的拮据解释为他的哲学起源,正是这段日子埋下了他日后的享乐主义种子。

1934年,巴特中学毕业。考巴黎高师是当时有志青年的梦想,巴特也不例外。然而,他的左肺出了问题,患上了肺结核;被送到比利牛斯山区治疗。不久,病情有所好转。第二年,巴特回到巴黎,在索邦大学攻读法语和古典文学学位,并帮助建立一个古典戏剧团体,并且同这个团体一道去希腊旅行。1937年夏天,巴特去匈牙利讲过课。这期间,由于肺病,巴特免除了兵役,在二战的头两年里,他先在比亚济茨后在巴黎公立中学教文学。然而,1941年10月,其肺病再次复发,他不得不放弃在国立学校教书的资格考试。两年后,左肺在巴黎逐渐康复,而右肺又出了问题。这样,他只得重新回到阿尔卑斯山的疗养院里,最后呆在内森(Leysin)。在此期间,他一度打算做个精神病医生,为此,还准备了几个月的医学预备学习。直

谁是罗兰·巴特



(上) Saint-Hilaire-du-Touvet 的疗养院。

(下) 疗养院的化妆舞会, 最右首的是罗兰·巴特。

到二战结束后的一两年时间里,巴特才完全摆脱了肺病的纠缠。

这两次肺病对巴特影响很大。在疗养院里,他读了大量的古典著作,并深深地喜爱上了米什莱和纪德,他读完了米什莱的全部著作。而且,正是在疗养院里,巴特开始了他最初的写作。他写过两篇文章,《论纪德和他的日记》以及论加缪的《局外人》的短文,后者正是《写作的零度》的最初雏形。在那时,“肺病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几乎要说,它就被举荐的”。^④对巴特而言,肺病的生活方式,有点像托马斯·曼《魔山》中的汉斯·卡斯托普的生活,患肺病的巴特常常严肃地考虑在疗养院度过一生的可能性。在疗养院里,巴特遵循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将生活弄得井井有条。他在疗养院的几年并没有感到远离世界的苦恼,他的内向气质使他沉浸在书本中,疗养院的集体生活经验还增强了友谊,并使他和他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是这五六年的经历,多年后,巴特在提起疗养院的生活时,充满感情地回顾说:“我有着奇怪的感觉,我比我实际上总是年轻五六岁。”^⑤疗养院的光使巴特感觉到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肺病使巴特免除了兵役,且避开了战争,受战争的影响不大。据苏珊·桑塔格声称,她没有在巴特的著述里发现“战争”一词,这在战后法国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他们一般都对那段耻辱的历史难以释怀。以萨特



在布加勒斯特,和学生在一起,前排右二为母亲。



在罗马尼亚工作时的研究所。

为首的法国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介入倾向，这在1968年学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相反，巴特正是在战后才逐步发展他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情趣的。也许，战争并没有给巴特留下什么阴影，一个在战乱时代还沉浸在历史著述（米什莱）和美文（纪德）中的人，不是一个天生的局外人吗？正是在战后，也是在萨特的影响下，巴特开始转向现代文学，并阅读了马克思的部分著作。1947年，巴特在《战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学短论，这些短论明显地和萨特有关，它既受萨特的影响，也针对着萨特，这些短文后来就组成了《写作的零度》。

巴特康复后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40年代末期，他先在图书馆作助手，后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教书，最后又去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学教书。在亚历山大他碰上了符号学家A.J.格雷马斯，后者向他介绍了语言学知识，巴特此时开始熟悉索绪尔的著作。与此同时，巴特还继续为国内的《战斗报》等左翼报刊写稿。不久，巴特回国，在教育部的外事机构任职。1953年，巴特

的第一部著作《写作的零度》问世,这部著作激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给巴特带来了一些国内的名声。这部著作明显地对萨特表现出一种抵制情绪,它针对着萨特的《何谓文学》唱了一些反调,在战后介入声一浪高过一浪的潮流中,巴特却露出了形式主义的尾巴。据说,在该书出版的前夜,巴特在巴黎街头散步,他预感到这部著作将产生的效果。然而,第二年出版的《米什莱自述》则反响平平。若干年后,巴特功成名就之际不无抱怨地说,《米什莱自述》是他非常喜爱的一部书,但无人喝彩,而《写作的零度》却长时间地被引用、谈论,尽管他早已对它失去兴趣了。

事实上,直到《神话学》问世,巴特才逐渐在巴黎知识界被人瞩目,这本书收集了巴特在50年代中期写的大量社会神话随笔——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神话学》有明显的揭露功能,它旨在剥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粉饰性外套。这种去蔽方式影响甚广,它或许是巴特遗留给后世的几件最重要遗产之一,而且,神话作为一个巴特意义上的用语,被广泛流传着。1960年,巴特在巴黎高等研究院谋得了一个职位,直到他去世。

有了固定的工作后,巴特开始潜心地写作了。整个60年代,都是巴特声名鹊起的年代。伴随着结构主义盛期的到来,巴特在巴黎知识界也如日中天,他成为结构主义在文学领域中的领导。1963年,巴特发表了他的第四部著作《论拉辛》,这部用新的方式重新研读拉辛的著作引发了一场可载入史册的论战。索邦大学教授雷蒙·皮卡尔发文《新批评还是新骗术》,激烈攻击巴特及其使用的精神分析方法。皮卡尔使用了一些“与死刑有关的词汇”,他要“伤害”、“刺穿”、“进攻”、“杀死”新批评,或将它推上断头台;他指责巴特等所作的批评是极端危险的。巴特写了《批评与真理》对皮卡尔气急败坏的指责作了平静的然而也是有力的回应。这场争论很快演变为一场“古典作家和现代作家”、“传记历史批评和新批评”的争论,结果,这场争论以巴特的雄辩理性获胜而告终;同时,也促进了新批评的进步和发展,为法国批评界日后的冒险扫清了障碍,并将批评界的保守主义埋进了历史的尘土中。

几乎是与此同时,巴特还发表了另外两部著作,《符号学原理》和《批



1949年1月,和研究所的同事在一起,后排右二为罗兰·巴特。

评文集》。前者对符号学作了全面的理论总结,全书充斥着索绪尔的身影;后者则在鼓励当时的先锋派:罗布-格里耶和布莱希特,为他们作了有力的辩护。同时在书中还涉及了极多的话题:结构主义问题,文学批评问题,元语言问题,作者和作家问题以及文学现状问题等,它汇集了巴特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对当代写作的诸种思考。此时,巴特的结构主义范型已大致确定,早期的神话学分析已被语言学模式取代了。正因为倡导结构主义,且对它进行了杰出的运用和解释,巴特被冠以结构主义巨头之名,他和另外几个人有力地将这个运动推到了巅峰,他们分享了结构主义在各个学科的领导位置:列维-斯特劳斯负责人类学,拉康分管精神分析学,福柯则肩挑思想史和哲学,阿尔都塞接过了马克思主义的担子,无疑,文学的地盘就留给了巴特。正是这五个人扩展了结构主义的权势,结束了人道主义或存在主义的统治。

事实上,巴特并没有在结构主义的床上躺多久,他早早地爬起来了,并轻轻松松甩掉了结构主义的花环。1970年,他的两部新作改变了他的形象,

这就是著名的《符号帝国》和《SZ》。《符号帝国》是他于1967年访问日本后的观察结果,在写作这本书时,他获得了极大的快乐。这本书一点不带结构主义的色彩,巴特将日本分解成几十个符号,对每个符号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方式容易令人回想起《神话学》的方式;重要的是,巴特并没按照结构主义原则将这些符号组织起来,从而观察它们的内在语法线索,相反,他仅把它们并置起来,承认它们各自的差异存在。《符号帝国》显然遗忘了结构主义的使命,不过,《SZ》却离结构主义更远了,或者说,它就是在和结构主义作对。这部著作是对巴尔扎克的一个不太著名的小说《萨拉金》进行的阅读实践,巴特在此正是以反结构主义之道行事,他将一个严谨规范的现实主义文本拆散了,并弄得七零八落,而且丝毫也没有统一它的打算。经过巴特的那只手——准确地说,是一只屠手,《萨拉金》已经面目全非了。

这或许是巴特进入所谓后结构主义时期的标志。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标签就是闪烁不定的能指,此后的巴特本人就像是这样一个能指,人们很难把握他的行踪了,他就是后结构主义本身。1973年,他的另一部影响甚广的著作《文本的快感》出版,这又是他的一次转向,一次阅读和批评的形式主义向阅读伦理学的转向。在此,他充分地提高了阅读的地位,用阅读伦理学取代了阅读技术。享乐阅读——巴特将它置于文本流通的中心位置——应视为一种生活哲学,它和写作一样,是一种重要的存在方式。这部书只能是功成名就后的产物,只是在彻底解决了拮据、生存压力和名利欲望之后,一个人才能奢谈无金钱元素的享乐要求。无疑,此时的巴特已有足够的资本要求精神上的惬意了。

1974年,巴特访问了中国,这次访问令他多少有些失望。因为是一个访问团,他们被安排得井井有条,而无法选择性地观看一些东西。他在中国逗留了三周,回国后,完全不像从日本归来那样,他几乎没为此次中国之行写下什么东西,尽管当时中国充满了符号,但对他毫无诱惑。第二年,由一家出版社推出的“永恒作家论丛”丛书,收了《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一书。这或许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书。巴特在此展示了自己的日常经验并对之进行了一些抽象的而又饶有兴味的理论清理。他以一种低姿态——一半是

谦虚,一半是隐含的骄傲——看待自己的著述生涯,贬低自己往往是优越感的外露,而这种形式又易于被他人接受,这再次显露出他的睿智。这部书另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东西是它的写作形式:对一个人的描述和记录——无论是对自我,还是他人——可以通过散乱的片断完成。《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是个不朽的范文,它堪与另一个传奇文本《看哪,这人》相提并论,尽管这两位主人公在谈论自己的声音上呈现出相反的语调。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巴特此时都有充足的理由进入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法兰西学院建成于16世纪,是当时国王和教会对抗的产物,教会把持索邦大学,国王试图建立一个开放的皇家讲座学院与之竞争,后发展为教育体制之外的最高学术机构,有50个左右的教授席位,为终生制,新增选教授由现有教授选举推荐。法兰西学院聚集了法国思想学术界的精英人物,为法兰西学院接纳实际上也就得到了最高的学术荣誉。

巴特此时也面临着反对意见,他和传统的学院式研究大相径庭。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写过一些随笔;而且,他总是出人意料地变化,使人难以摸清他的思想体系,同时,这也为他的思考和论断到底有无真实的价值和凭据埋下了疑问;另外,巴特似乎总是在处理一些小的主题,而不是学院内那留存下来的恒久而宏大的命题,总之,巴特身上的世俗气息压倒了学院气息。但是,关键时候,福柯起了作用。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的友谊中断了十多年,彼此没有来往。主要因为两人在一起时,经常发生冲突。那时,他们尚未获取盛名,他们既相互欣赏,又相互竞争,结果不欢而散。当巴特想进入法兰西学院时,福柯已是那里的教授了。显然,就年龄,所获成就以及心理成熟度而言,两人重续友谊是当然的,也是必要的,况且,两人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巴特还曾为福柯的《疯狂与文明》写过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并极其准确地道出了福柯这部著作的非凡价值。

福柯回击了那些对巴特的指责。他说:“我要补充一点,如人们所说,公众对他的兴趣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时尚,但是,我们可以使怎样的历史学家相信,一种时尚,一种激情,一种迷恋乃至夸张的说法不是反映特定时间内某种文化中的丰富内涵的存在?而这些声音,这些我们在大学以外听到

的和正在听的声音,你们难道不认为它们是我们当今历史的一部分,你们难道不认为它们将会成为我们历史的一部分?”^⑥福柯对巴特的辩护最终使巴特入选。

这无疑是巴特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演中,巴特动情地提到了福柯:“请允许我冒昧地提到米歇尔·福柯,本来出于我们的友谊,应当对此保持缄默的,我的始终如一的感情,思想与感激都与他联系在一起,因为正是他向教授委员会提出设立这个讲座和主持这个讲座的人选的。”^⑦从此,两人尽释前嫌,重新开始了友谊,而且更为纯净。的确,巴特在此时已关注到福柯眼下的主题:权力。在这次讲座中,巴特也多次提到了权力,他将权力嫁接到他的惯常主题中:语言结构。语言结构乃是权力的寄生物,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借助语言、语言结构来现身的。

巴特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讲座大受欢迎,法兰西学院前门庭若市,连外国游客和退休老人都涌向巴特的课堂。同年,巴特的另一部著作《恋人絮语》问世,这部著作也是一个研讨班的结果。起初是打算以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作对象,来研究情话的种种模式和规律;后来巴特改变了初衷,他直接将恋人情境展示出来而抛弃了那种转述性的分析话语。写作者隐退了,只有一些爱情戏剧上演着。这部著作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关注,它被公众广泛谈论着,巴特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令他始料不及。巴特最初的设想是这本书能有500个读者就不错了。对《恋人絮语》所激起的反应,《花花公子》评论说:“不错,爱的主题已经过时了,然而,由于《恋人絮语》这样的书,爱的春天又将返回。”^⑧写作这本书,巴特宣称是为被人所爱,他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他获得了一般法兰西学院教授所无法获得的民间声誉和注意:“从《神话学》到《恋人絮语》,罗兰·巴特对社会不同方面所作的分析,被谈论着、模仿着,有时也被嘲弄着,但从没有被忽视过。”^⑨

1978年,巴特母亲去世,这令巴特无比悲痛。从小,巴特就和母亲相依为命,因此,母亲的死对他打击很大。在他最后一部著作《转绘仪》(1979)中,巴特就意图从母亲的一幅照片中“引出全部摄影术”,而且在此书

中,他也表达了对母亲的纪念:“我失去的不是一个人(母亲),而是一个存在者;不是一个存在者,而是一个品性(一颗灵魂):不是不可或缺者,而是不可替代者。没有母亲我可以活下去(我们大家早晚都会碰到这种事);但生命中留存下来的东西将是绝对地,完全不能加以限定的(没有品性)。”^⑩据说,母亲死后,巴特一直郁郁寡欢,以至于在1980年车祸后,有朋友认为巴特的去世和他的这种悲戚的丧母心态有关。

1980年2月25日,巴特和几位政治家在穿过法兰西学院门口的学院路时,被一辆洗衣店的小卡车撞倒,巴特被送进医院。不久,病情即有所好转,且能接待来访者,但在3月26日,巴特却逝世了。这使他的死变得扑朔迷离,人们无法弄清他的死因,因为车祸似乎并没有致巴特于死地。还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为巴特的死致悼词,福柯的悼词大概是献给巴特的最后神曲,是一个天才献给另一个天才的绝唱,它堪称是巴特流世的碑文,面对着法兰西学院的全体教授,福柯庄重而充满感情地说:

几年前,我曾建议你们能接受他并成为你们中的一位,他20多年不懈的努力获得了社会公认,并具有独创性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使我无须借助我与他的友谊。我不会忘记他。他的事业还在。他的事业独树一帜丰碑。它还会说话,其他的人可以让它说话,或谈论它。因此,请允许我在今天下午披露这惟一的友谊。这种友谊与它所痛恨的死亡至少在寡言少语这点上是相似的。你们选举了他,就了解他了。你们都知道,你们选择的是少见的智慧和创造的平衡。你们选择的——你们也知道——是一位对领悟事物本来的面目具有奇特能力的人,他以前所未有的新角度更新事物。你们知道,你们选择的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个不同凡响的教授,他的教学对于听众不是一堂课,而是一种经验[……]。命运让物的愚蠢暴行——这是他惟一可以憎恨的现实——结束了所有这一切,而且就发生在这所我曾请求你们让他进来的殿堂的门口。如果我不曾知道他在这里很幸福,如果我不是感到应该从他那那里给你们带来越过忧伤的友谊的微笑,那我是承受不了这苦痛的。^⑪